



赵昆生著

三国

政治与社会





赵昆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三国政治与社会/赵昆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004-9667-0

I. ①三… II. ①赵…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三国时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4502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高 婷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公元 184 年，黄巾军大起义爆发，天下大乱，东汉统治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各路大小军阀在镇压义军中，趁机招兵买马，占山为王。相互间兵戎相见，各自为阵，军阀混战与割据的局面出现。

新旧军阀不断地涌现和沉浮，势力范围伸缩不定，控制的区域也随着军事斗争的胜败而经常变动着。这是一个显耀武力、崇尚战争的时期。战争兼并、腥风血雨、杀人掠地、谋略攻防、机关算尽是这个时期的基本活动。在旷日持久的战争厮杀中，培育出了曹操、刘备和孙权等为代表的新的统一政权重建力量。

战争的作用在三国建立阶段得以充分表达。它破坏了汉家天下的统治秩序，摧毁了旧有的政权形式、尊卑等级框架以及改变着原有的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扰乱了各阶层生产、生活轨迹。百废待兴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这块被战火燃烧过的土地上，各阶层民众热情地盼望着新的安定因素迅速出现，希望尽快地理疗生理和心理所遭受到的累累创伤，回到桃花源似的自然经济生活状态中去。人们以自己可能作为的方式，实现着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生活平静的理想抱负。政治家们随着三国局面的出现，在各自效忠的政权范围内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智，建筑新的治理模式。在战争的废墟上，沿用东汉以降原有的

国家管理框架，或者在战争中新出现的军政统治方式，结合统治区域的人文地理环境，加以变易和修订，相继建立了曹魏、蜀汉和孙吴三个国家。三国统治形式源于汉而又不完全同于汉。创立了最适应所在地区政治、军事、文化环境诸多新制度。对三国统治方式和各种制度等的研究，有益于探寻社会转型期间的政权模式的调整和新旧制度的演进，加深对三国历史的认识。

三国的建立者不同，建国时所应对的社会形势、势力阶层、文化风俗、传统习惯也不同。因而所建立的统治政权也有诸多不同。三国对峙了几十年，各国针对国内所遭遇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矛盾，从容应对，有所损益。围绕着所在国各自的上层建筑，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社会转型中纷纷表达自己的意见，重申自己的利益诉求，为新旧更替贡献自己的智慧，设计各式各样的实施方案。出现了紧扣某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主题的思想交锋、观点争执、问题评议等社会思潮。

这个时期是一个相互选择的时代。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军阀割据需要大量的文韬武略之士辅助。军阀敞开用人大门，唯才是举、招贤纳士，为天下有志之士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各种人物都可以从这个时代大舞台中找到适合自己身手的角色安排。与此同时，战争也破坏了官僚士大夫的正常入仕、晋升之路，官僚士大夫们一方面逃命于乱世，坐观天下聚变，分析各路军阀走势，得出许多经验性的判断；另一方面，面对军阀们的唯才是举，突然间又出现了比传统的仕进方式更多更便捷的飞黄腾达的机会，于是，士人们如鱼得水，穿梭于军阀之间，充分地表达自己精心为军阀们设计出的针对性强的治国用兵之道，希望得到高官厚禄，施展自己的精心准备的适用性强的多种预案，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同时，又仔细观察、比较所际遇的各路军阀才德及

其胸怀抱负，将自己的才华施展与军阀的可能接受的程度结合在一起考察，择林而栖。不断地更换谋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主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这是一个多向选择的时代，为广大有雄心大志的政治军事家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人才储备，为广大有真才实学的官僚士大夫打开了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政治家、军事家和官僚士大夫一道，最大程度地抒发着自己的治国用兵的胸怀，书写出一篇篇惊世骇俗的壮丽诗篇。

这是一个张扬个性、炫耀个体力量的时代。东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解体，其意义不仅仅是出现了分裂割据，又一次演绎着政权重整和国家建立。更重要的一点是人们摆脱专制主义极权长期完成的对人们思想意识的禁锢。各阶层的人们，尤其是在思想文化界中，思想解放、信仰多元、精神独立、文化放达、态度随意、多姿多彩。可以从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中寄托自己的人生追求，可以从玄学玄言诗中抽象连自己都没有理清楚的名理哲言，可以通过诗歌、文赋、怪异中宣泄自己的远大理想，可以撰文修史总结人类前进中的得失，也可以游山玩水、畅饮纵欲抒发自己的人生态度。总之，这是一个个性张扬的时代，是中国历史长河中鲜活生命个体热血澎湃的重要时期之一。

所以，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历来受到史家的重视。二十多年前在安徽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昆生师兄选择了三国历史作为研究方向，在万绳楠师指导下，顺利完成学业。以后在大学执教中，一直坚持三国史的研究。陆续读了该书草稿，有一些个人的看法：

1. 撰写体例学习万绳楠师《魏晋南北朝史论稿》的范式，以论述各国在建国中所呈现的不同社会现象为主，阐释三国历史中的种种政治与思想文化特征，以求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深度认识。

2. 对三国历史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专题探讨，如：魏、吴的职官问题；正始之音与玄学的出现；诸葛亮的《出师表》与北伐问题等等，全面具体地解读，得出一些学术性的见解，成一家之言。

3. 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和历史学的不同角度，透视和解释三国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诸多表象。新的看问题角度和方法必然产生出对诸多历史问题论述中的新看法。该书中有许多此类新解释和结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而言之，该书是昆生兄多年悉心研究的成果，一些篇目已经以论文的方式发表在不同的学术刊物上，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该书的出版仅仅是昆生兄学术研究的又一个起点，期待着更多的佳出版。

卜宪群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日

目 录

序	卜宪群(1)
第一章 序论	(1)
一 袁绍与汉末军阀混战	(1)
(一)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	(1)
(二)袁绍及其军阀特征	(10)
二 三国鼎立之际的国家重建思想	(15)
(一)汉末社会批判思想	(15)
(二)畿纬等神秘预言的渲染	(18)
(三)否定刘氏天下的正统观	(25)
第二章 魏国政治与社会	(30)
一 曹魏集团形成过程中的思想与方式	(30)
(一)曹操政治社会化过程	(30)
(二)曹魏集团政治价值观的形成	(39)
二 魏国的权力中枢	(49)
(一)中书	(49)
(二)侍中	(64)
(三)尚书	(72)

三 “浮华交会”与曹魏政治	(82)
(一)曹操时期“破浮华交会”与“唯才是举”	(82)
(二)魏国建立后的“浮华交会”	(96)
四 魏国的思想文化	(112)
(一)“四本论”	(112)
(二)“正始之音”	(132)
(三)律变思想	(144)
(四)魏晋之际的社会理想	(158)
五 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	(169)
(一)门阀政治与司马氏的崛起	(169)
(二)魏末君臣对司马氏的反抗	(173)
(三)魏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司马氏化	(179)
(四)九品中正制与魏晋更替	(196)
第三章 吴国政治与社会	(209)
一 孙吴政权的建国道路	(209)
(一)宗族势力与汉末政治	(209)
(二)孙氏势力与南方强宗豪族	(216)
(三)孙吴政权的基本特征	(225)
二 吴国的丞相制	(235)
(一)丞相是常设职官	(236)
(二)丞相职官系统	(245)
(三)相权存在的必然性及其与君权的矛盾斗争	(260)
(四)君权与相权的关系	(273)
三 吴国的权力中枢	(290)
(一)中书系统	(290)
(二)尚书权重	(292)

(三)世袭领兵制·····	(299)
第四章 蜀汉政治与社会 ·····	(312)
一 蜀汉政权出现的特征和方式·····	(312)
(一)刘备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	(312)
(二)蜀汉政权的势力构成·····	(319)
二 《出师表》与蜀汉政权·····	(328)
(一)蜀汉政权的权力分配和运行方式·····	(328)
(二)政治与社会伦理秩序·····	(335)
三 蜀汉统治特征·····	(350)
(一)诸葛亮与蜀汉政权·····	(350)
(二)诸葛亮北伐问题·····	(362)
(三)蜀汉政权用人路线·····	(368)
后 记 ·····	(372)

第一章

序 论

一 袁绍与汉末军阀混战

袁绍，字本初，东汉末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起兵讨伐董卓，成为北方最大的封建割据势力，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被曹操击败，从此退出北方舞台，两年后死去，前后仅十余年时间。与此同时，对手曹操却由一个从属于袁绍、兵不过千余的奋武将军，迅速壮大为统一北方的最大军事力量。这段历史过程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袁绍能在短短十年内由一个郡守迅速成为北方最大的地方割据势力而又迅速销声匿迹？袁绍与曹操军事势力的消长反映了当时社会什么实质性问题？本书拟以袁绍为主，参与同曹操的比较。来全面剖析袁绍，以求得对那个时代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一）军阀混战局面的出现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以后，“初平元年，[袁]绍遂以勃海起兵，[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以

讨卓为名。绍与王匡屯河内，佗屯颍川，馥屯邺，余军咸屯酸枣，约盟，遥推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①。值得注意的是，袁绍起兵时不过是一个任职不到一年的勃海郡太守，而其他军阀则大者以州起兵，势力、实力、占领区域均强于袁绍，小者也是以郡起兵，实力与袁绍不相上下，大家公推袁绍为盟主，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董卓）之有也”^②。这是城门校尉伍琼对董卓的劝告。可见袁氏家族和其他门阀世族阶层一样，在东汉末已形成相当大的社会势力和影响。二、“中平五年，初置西园八校尉，以绍为佐军校尉”。李贤注引，乐资《山阳公载记》载：“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③西园八校尉是东汉政府为镇压黄巾军而组成的最强的军事力量，袁绍身居中军校尉，权力仅在上军校尉、宦官小黄门蹇硕之下。宦官被诛以后，袁绍是这支军事力量的统帅者。三、袁绍大诛宦官，结束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深得各级封建地主官僚、士大夫的拥护。四、董卓欲废少帝立献帝，袁绍当面反对，他是当时第一个敢于面对面反对董卓专权的人，此事成为讨董运动的序幕。总之，袁绍既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更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成为动乱之际各种正在发展的军事力量和避免战乱的人们的靠山。“是时豪杰既多附绍，且感其家祸，人思为报，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为名。”^④

从袁绍的暴发史中，我们看到东汉末年地方豪强势力在君主专制制度削弱的情况下自然地发展起来，使封建政治形成了皇权

① 《后汉书》卷74《袁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7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374页。

④ 同上书，第2376页。

和地方割据势力两种力量相反运行过程，最后地方割据势力必然压倒皇权。而地方割据势力所特有的互不相属、不平衡的多头关系，使他们之间的联合仅靠实力对等加以维持，一旦出现比较强大的新的军事实力，那么新的分裂就不可避免，一直到又形成新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分裂、组合、不断趋向于稳定的过程，就是军阀混战的过程。促使军阀联合体不断裂变的因素就是战争。东汉末到三国初的中国社会形势就反映了这种情况：袁绍就是在军阀混战中暴发的代表性人物。

在军阀混战中，中国逐渐出现了几个割据中心。官渡之战前，在北方最大的要数袁绍、曹操，南方数刘表、刘焉、孙权集团，形成了明显的对峙局面。同时，重新走向统一的积极因素也在军阀战争中酝酿成熟。首先是在兼并战争中产生了具备进行统一的强大军事集团。不论北方的袁绍、曹操集团，还是南方的孙权、刘焉集团，都具备了退可以割据一方，进可以夺取天下的实力。其次是出现了重新统一中国的思想要求和战略理论。军阀混战中，许多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纷纷投奔自以为值得辅佐的军事人物，为之出谋划策，一时思想活跃，出现了各种争雄天下的战略主张，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统一中国的社会舆论和一套套比较完整的战略理论。其中较全面的，有学界所公认的诸葛亮的《隆中对》和荀彧为曹操的谋划。但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被学界所忽略的沮授为袁绍所提出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完全可以同诸葛亮的《隆中对》相媲美。《三国志·袁绍传》载有沮授劝袁绍的话：“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

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从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①加之官渡之战前提出的“务农逸民”的建议，概括起来，包括三个方面：一，利用自己在东汉末已形成的有利社会地位，发展自己的实力，首先统一北方，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二，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三，北方基本安定以后，必须把汉帝掌握在手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名正言顺地讨伐不服，最后夺取天下。

从董卓之乱到官渡之战前夕，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一些军阀发现汉室的衰亡不可避免，而自己已经具备了割据一方的实力，便开始走向分裂割据的道路。于是军阀混战的性质从匡扶汉室、除暴平乱转变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而当时最具有统一北方实力的军阀集团，只剩下了袁绍和曹操。就统一的民族国家已经形成而言，统一是历史的要求和趋势，人们从观念上、心理上、社会发展需要上都拥护统一，反对分裂。下面我们以这个时代特征为背景，通过对袁绍与曹操的比较研究，来认识袁绍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1. 在战争指导思想上的区别

曹操于建安七年“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②。而袁绍“既并四州之地，众数十万，而骄心转盛，贡御稀简。主簿耿包密白绍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以从民心。’绍以包白事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未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③。曹操起兵就明确表示为天下除暴乱而袁绍起兵的指导思想则错综复杂，既有除暴乱的成分，

① 《三国志》卷6《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2页。

② 《三国志》卷1《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页。

③ 《后汉书》卷74《袁绍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90页。

但主要是称王割据。东汉末世家大族不仅经济上已经成熟，政治上世代把持政权，而且产生了完全摆脱君权、割据一方的动机。以这种动机为指导思想的世家大族起兵，虽以除暴乱为名，一时声势浩大，但由于其指导思想的限制，实际上不可能共诛暴乱而必然“失天下之望”。

2. 在安定社会秩序上的区别

曹操从跻身于政治舞台时起就很重视安定社会秩序。在军阀混战中，更注重依法治国，所谓“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①。他的“道”即法律、法令，曹操在战争中除了以军法约束部下，还不断颁布法令，对自己的统治区域实行法治，例如建安九年“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②。袁绍则不然，他倚仗兵多将众，自视天下无敌，对所属区域和部下不善治理，以至“兵多而法不整”，军队纪律混乱，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同时，在袁绍统治区里，“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③。而豪强兼并土地，搜括盘剥，正是袁绍统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袁绍对安定社会秩序的态度不仅反映了门阀世族阶层本质上的腐朽性：善于空谈而不善治国，仰慕虚名而不重实际。也表现了分裂者的志向和目的：没有统一中国的志向，就没有治国安邦的打算，以割据一方为目的，带有浓厚的流动性和暂时性。

3. 在对待汉帝问题上的区别

董卓之乱后，皇帝成了军阀手中的玩物。在如何对待汉帝的问题上，袁绍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沮授以为“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而郭图、淳于琼反对其议，

① 《三国志》卷1《武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页。

② 同上。

③ 《三国志》卷11《王修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7页。

谓“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①。结果袁绍不用沮授计，而终于“会太祖迎天子都许，收河南地，关中皆附”^②。袁绍和曹操对待汉帝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统一和分裂的区别。当时汉帝仍是统一的旗帜：汉末军阀混战之所以出现，从形式上看就是起于拥护汉帝和驱除暴乱的斗争。袁绍之所以一时为天下所拥护，主要就在于他尽诛宦官，清除了东汉末削弱中央集权的一大腐朽势力，并敢于当面指责董卓专权，表现了维护汉帝、匡佐皇室、反对暴乱的志向。同时，东汉统治已近二百年，刘家天下的正统观念已为天下所接受，尤其是普通官僚士大夫阶层，深受董仲舒以来独尊儒术的影响，以汉室为正朔所在。他们认为，汉室的暗弱源自皇上蒙尘、小人当道，因此自己的责任就在于辅佐皇室，清除奸逆，恢复汉朝统治。如曹操重要谋臣荀彧临死都反对曹操取代汉帝即是一例。汉室在习惯上、观念上、感情上仍不失天下。因此军阀虽割据一方，形式上仍不敢建树帝号，改朝换代。再者，军阀混战之时，虽然皇权衰弱，但强权势均力敌，暂时还不可能取得绝对优势，于是趁天下混乱，人心思定之际，抬出汉室，借汉帝之名，从道义上、观念上稳定天下，从感情上笼络人心。可见，东汉末这个时期，皇帝的名与实发生了分离，他的名不仅是人民对统一、安定的回忆，也是他们的政治愿望和要求，故成了统一安定的旗帜。谁掌握了这面旗帜，谁就取得了政治上、道义上的主动性。

① 《三国志》卷6《袁绍传》注引《献帝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5页。

② 《三国志》卷6《袁绍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页。

4. 在对待黄巾起义问题上的区别

东汉末期的残暴统治导致了 184 年的黄巾军起义。黄巾军起义是东汉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东汉末军阀混战中，农民军仍然存在，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农民军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建立代表自己阶级利益的农民政权，因此失败是必然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在对待农民起义这个重大问题上，本质上是一致的。最终目的是重新给他们套上封建生产关系的枷锁。我们在承认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都对农民起义军实行专政的前提下，应该注意到他们对待农民起义军的具体手段是不同的。手段的不同，对于在一定范围内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最后达到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的效果也是不同的。曹操集团对待黄巾军的政策，一是进行收编，把三十万青州军收编为自己的军队，增强自己的实力；二是实行屯田，既提供战争粮草，又安定社会秩序。这两个政策，对农民军不是从肉体上消灭，而是因势利导，使农民得到一些起义前得不到的东西，比如土地、减免田租等，从而使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调整，社会秩序重新出现了安定。袁绍集团则不然。初平四年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众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氏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①。可见，袁绍集团对农民军的镇压是极其残暴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农民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者，社会动乱的程度如何，可以从小农经济的稳定程度中得到了解。进行统一事业，安定社会秩序，首先必须安定农民阶级，恢复小农经济。曹操和袁绍对农民都实行专政，但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

^① 《后汉书》卷 74《袁绍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382 页。